



魯迅批孔及儒雜文選

鲁迅批孔反儒杂文选

广西大学中文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鲁迅批孔反儒杂文选

广西大学中文系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0册

书号：10113·46 定价：0.25元

编 者 的 话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他的战斗一生中，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写下了许多篇光辉的杂文。他用杂文这个思想武器，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他们所豢养的反动文人以尖锐的揭露、深刻的批判和沉重的打击。

这本书收入了鲁迅批判孔老二和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的杂文十三篇。这些批判都是和当时的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通过对于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也揭露了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思想对于人民的毒害。

在鲁迅生活着和战斗着的那个时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象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他们互相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压迫、剥削和毒害广大的中国人民。孔孟之道就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用来麻痹和欺骗人民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几千年来，

孔孟之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之中，要彻底清除这种反动思想的影响，则要费很大的气力。鲁迅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直到后来，对于孔孟之道曾经持续地进行过顽强的不懈的斗争。

这里编选的十三篇杂文，并不包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全部文章。除了本书所收的杂文之外，在鲁迅的另一些作品中，也表现了同样的战斗精神。读者学习了这几篇之后，可以进一步阅读更多的鲁迅作品，更深刻地了解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批孔反儒斗争的重要意义。

为了辅助广大的工农兵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阅读这些杂文，我们采用了已经出版的鲁迅杂文的一些注释并稍作补充，同时，对于鲁迅写作这些杂文的时代背景，在下面又作了简略的介绍，以供阅读时参考。

—

尊孔还是反孔？从来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一切要求革命的人们都是反孔的。但是，对于孔老二和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批判得最彻底的则是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是用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些最坚决的革命战士，鲁迅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代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以及革命群众运动推动下，鲁迅立即投身到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斗争中去。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反对封建家族制度和吃人礼教。与此同时，他又发表了“随感录”三十五、四十八等篇杂文，对于“国粹主义”发起猛烈的进攻。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旧道德，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孔孟之道，所反对的旧文学，就是那些宣扬孔孟之道的僵死的文言文。**“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这

场激烈的斗争中，鲁迅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的杂文象匕首一样，直刺入敌人的心脏。

五四运动之前，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曾经存在过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当时的所谓**“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在这场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比它在政治战线上的表现还要软弱，**“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大为嚣张。袁世凯称帝期间，大肆鼓吹**“尊孔读经”**。在其臭名昭著的**“天坛宪法”**草案中曾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随后又在他的**“教育纲要”**中宣扬**“各学校均应崇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在袁世凯卵翼之下，不少遗老遗少纷纷跳了出来，组织**“孔教会”**，出版**“孔教会”**杂志；曾经一度是维新人物而后堕落为复辟小丑的康有为俨然以孔老二自居，在他主编的**《不忍》**杂志上，大力提倡孔教。封建卫道士林琴南大骂反对封建礼教的人是什么**“覆孔孟，铲伦常”**，**“禽兽行”**。当时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也跳了出来，公开发表**《联合中**

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中外反动派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在当时的一片乌烟瘴气的社会上，便出现了什么“哲学算命”、“科学扶乩”、“精神能改造肉体”等种种谬论。“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借封建复古主义僵尸还魂，在“保存国粹”的旗号下，大呼“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大肆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论调。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随感录”（共二十七篇）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来说的。他在杂文中给予了国粹主义者和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鲁迅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复古主义者所宣扬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种种封建道德，灵学扶乩、迷信鬼神，等等奇谈怪论，这一切“国粹”统统都应该打倒。鲁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采取彻底的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封建礼教、封建文化糟粕加以剖析，提出必须割掉封建复古主义的思想毒瘤——“国粹”。鲁迅认为封建遗老遗少们所鼓吹的“国粹”，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和人民势不两立。他们散布“人心不古”，“今不如昔”的反动论调，其目的是要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成长。鲁迅说：“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

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鲁迅指出：他们的满车“祖传”、“老例”、“国粹”等等货色，就是为了把要求革新的人们“活埋下去”。中外反动派鼓吹保存“国粹”、反对改革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鲁迅大声疾呼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鲁迅就是这样集中火力，向中外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鲁迅在反对“国粹主义”的杂文中表现出来的战斗思想，在当时是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的。鲁迅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外反动派，这些人是阻碍中国人民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

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新军给予了封建主义复古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使得一些猖獗一时提倡“国粹”的遗老遗少暂时消声匿迹了，但是，尊孔和反孔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向前发展了。第一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倒台了，段祺瑞之流继之而起；康有为、林琴南等封建卫道士过去了，接着又有人出来提倡“尊孔读经”。鲁迅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

二五年十一月二日，段祺瑞执政府教育部部务会议通过决议，规定小学生也要“读经”，从初小四年级开始，每周一小时，到高小毕业为止。北洋军阀政府教育当局利用他们所把持的政权机关，强力推行封建教育，强迫人民接受孔孟之道，儒家的反动思想。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这篇杂文中，立即揭露了反动派的“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的欺骗性；在《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等杂文中，更深刻地指出他们“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适合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的需要，是迎合外国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需要，以“尊孔读经”为手段，“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来欺骗和麻痹中国人民。他们宣扬孔孟之道，赞美“中国固有文明”，都是“别有用意”的。鲁迅再三提醒人们切勿相信，以免受骗上当。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从多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儒家思想的反动本质。

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指出：中国历代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从来就是利用儒家思想来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的，他们早已有了“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于是就捏造“理论”根据。这就是“圣贤之徒”所反复宣扬的“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等反动谬

论。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象反动统治者所想象的那么“美妙”，他们要想实现“黄金世界的理想”，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鲁迅讽刺他们说：“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反动统治者想把“圣经贤传”当作麻痹人民的“毒针”，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正一天天觉醒起来，因此，“阔人的地位”总是不得稳固的，他们的“黄金世界的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天下也总是不得太平的。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又引用了许多中国历史事实，进一步揭露儒家所提倡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鲁迅鲜明而尖锐地指出：“古圣先贤”一面传下来一些“保古守旧的格言”，同时他们也就安排下了“吃人的筵宴”。在存在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什么“仁义道德”的相亲相爱的关系，而是“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鲁迅怀着愤怒和憎恨，对于所谓“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进行深刻的揭露，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强烈反对这种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

吃人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篇杂文的结尾处，他号召青年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决不能够让这“人肉的筵席”再摆下去！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杂文中，又揭露了那一些别有用心地吹捧“中国固有文化”的外国侵略者，说：“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揭去“尊重”的外衣，便露出了“利用”的本相。中外反动派一齐叫嚷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鲁迅说：“这就是‘软刀子’。”中外反动派所“尊重”的“中国文化”，和人民群众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外来侵略者口口声声宣称“要保存旧文化”，其目的就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他们“尊重”中国的封建文化，就是妄图利用这把“软刀子”来宰割中国人民。

鲁迅在深入剖析封建思想文化对于人民毒害的时候，决不轻易放过孔老二和“圣人之徒”的一切反动言论，不论他们披上怎样骗人的伪装。鲁迅坚决主张对于儒家思想进行持久的批判。他反对“中庸之道”，主张“痛打落水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杂文中，充分发挥

了这样的思想。

一九二五年，革命浪潮从南方兴起，它的影响很快达到了北方。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联系起来。在革命浪潮冲击之下，当时提倡“尊孔读经”，主张“整顿学风”，压迫学生运动的反动势力垮台了，女师大学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时有一些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人们，如林语堂之流，以折中调和的姿态，大谈其“费厄泼赖”精神。他们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对于“塌台人物”，“不应再施攻击”，“不打落水狗，……也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和封建势力互相配合，制造反动舆论，妄图麻痹人民斗争意志，解除人民思想武装。鲁迅在这篇杂文中，针对这种谬论，立即予以有力的驳斥。他反复强调指出：狗就是狗，狗性是不会改变的。他坚决主张：必须痛打落水狗。不打落水狗，反而被狗咬了，是自讨苦吃。他说：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鲁迅以历史上血的教训，教育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对于狡猾的敌人，切不可宽容，讲什么“中庸之道”。鲁迅深刻指出：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是不讲“中庸之道”的，“待到

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华盖集·通讯》）革命人民切勿轻信谎言，受敌人的欺骗，如果受骗上当，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在鲁迅写了这篇文章之后不久，事实的发展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北洋军阀段祺瑞在一度退居幕后，即所谓“塌台”之后不久又上了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他的执政府门前命令卫队开枪屠杀徒手请愿的爱国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就是又一个血的教训！

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也不断深入。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曾经提倡过“尊孔读经”的北洋军阀彻底垮台了，国民党新军阀接着又吹捧孔孟之道。蒋介石在发动了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发动了对于党所领导的国统区革命文化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尊孔读经”就是他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种反革命“围剿”都惨败了，**“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的鲁迅，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则是更坚决更深刻更彻底的。

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了配合他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作为“精神动员”，提倡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而其实是最无耻的“新生活运动”。在中小学校推行“尊孔读经”。一九三四年七月，明令规定孔丘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其后又特别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蒋介石继袁世凯之后又曾举行过“民国”以来的第二次祭孔“盛典”。他们都是企图利用这“盛典”来粉饰太平，掩盖他们对于人民的残酷镇压，血腥统治。袁世凯当时穿的是古怪的祭孔的服装，蒋介石这次用的是往古的“韶乐”。鲁迅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杂文中，立即拆穿了这个骗局。他引用了当时报纸上同时刊登的两条新闻，作了一个对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反动统治。鲁迅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和中国人民大众完全处在势不两立的敌对地位。他们所要维护的是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在那暗无天日的黑暗反动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民大众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中国人民要求得解放，只有推翻国民党的黑暗反动统治；要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人民的欺骗，就必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

鲁迅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孔老二这具僵尸作为欺骗和麻痹

中国人民的工具。他们妄图捧出孔老二和宣扬孔孟之道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在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在东北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把他们在块土地上血腥的统治，说成是什么“王道乐土”。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又深入华北，妄图灭亡全中国，这时又在东京修建孔庙，更进一步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大力鼓吹“王道乐土”。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杂文中，予以尖锐的揭露，指出所谓“王道”这个东西，“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但是真正的“王道”，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日本侵略者想利用“王道”来欺骗中国人民是枉然的。

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著名的杂文中，更进一步彻底揭露了中外反动派吹捧孔老二的险恶用心和他们的可耻下场。鲁迅认为：孔老二这位“摩登圣人”，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很倒霉的，曾经遭受过许多人的嘲笑和轻蔑；他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完全是后来历代反动统治者吹捧起来的。各个不同时代的反

反动统治阶级根据他们的需要，为了他们的利益，对于孔老二和孔孟之道都大大加以吹捧，于是孔老二就变成了一切反动派的“敲门砖”。这一班反动统治者在他们渐近末日之时，都想利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敲开他们各自期望的“幸福之门”。可是孔老二这具二千多年前的僵尸却救不了他们的必然覆灭的命运。那“幸福之门”对他们哪一个也没有开，都在门外一个个倒毙了。

鲁迅对于孔老二和孔孟之道的揭露和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揭露和批判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老二已经死去二千多年了，林彪反党集团在二千年后抬出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继承了他的反动衣钵，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狂热鼓吹“克己复礼”，就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反对社会变革，开历史倒车，代表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疯狂鼓吹孔孟“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